

抗日战歌的文化力量

■朱廷涛 朱若男

艺境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气壮山河、催人奋进的战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体系。这些战歌以音符旋律的生动感召、抗战叙事的艺术升华和民族记忆的集体建构，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它们不仅在当时发挥着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已成为激励后人勿忘国耻、共御外侮、珍爱和平、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与文化符号，至今影响着我们。

精神动员的“文化武器”

抗战初期，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抗日战歌迅速承担起“文化武器”的使命，快速唤起民族觉醒，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其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歌曲旋律激昂，节奏紧凑，一经传唱便风靡全国，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战斗号角。

193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与日军白刃格斗的胜利为背景，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核心意象，直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决心。

1939年，在抗日紧要关头，从延安窑洞里飞出献给八路军的歌《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更以铿锵有

力的节奏和坚定豪迈的歌词，塑造了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这首歌不仅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也在精神上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西北战区服务团组织小分队深入河北平山县，小分队成员牧虹（作词）、卢肃（作曲）执笔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平山县民兵以“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为口号，在反“扫荡”中展现出顽强战斗力。“团结就是力量”的呐喊点燃人们的热血，激励根据地军民万众一心、奋勇抵抗，让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歌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抗战主要形式之一，因其兼具精神动员、政治宣传和民族凝聚等多重功能，故而成为“文化武器”。作为“软实力”，它与游击战、运动战等军事斗争“硬实力”，共同构成赢取抗战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

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

对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深刻的民族觉醒。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战歌以“共同意象”构建民族集体记忆，黄河、长城、松花江、太行山等地理符号频繁出现在战歌歌词中。它们是自然景观，也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战歌就像“文化纽带”一样，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

1936年，作曲家张寒晖目睹东北军流亡惨状，感同身受地创作了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那凄婉深

沉的旋律如泣如诉，唱出了国破家亡之痛。这首歌最初在西安传唱，迅速引发全国民众共鸣，传遍大江南北。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1938年，由桂涛声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以太行山为背景，描绘了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浴血奋战的场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朴素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全民抗战的壮阔图景。这首歌不仅在军队中传唱，也在乡村、工厂、学校广泛传播，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情感纽带，不断强化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

1939年，诗人光未然与作曲家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首歌以黄河隐喻中华民族的血脉，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抗日救亡的坚韧不拔融为一体。其中的标志性作品《保卫黄河》，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开篇，气势磅礴，充满力量，在前方部队和后方民众中激起强烈共鸣。“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高亢呼号，更是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共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保家卫国。

抗日战歌，通过语言、意象、情感与旋律的多重机制，将“中华文化”中的山川、河流、人文等各种元素凝聚在一起，将“你我他”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铸成一个在危难中彼此支撑、在抗争中共同前行的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传承的“文化血脉”

抗日战歌不仅在当时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时代强音，唤醒了和培育了那一

代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斗志，而且作为革命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1937年，凯丰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将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直接写入歌词。抗大校训也直接转化为吕骥谱曲时的节奏设计，从而赋予这首歌独特的音乐风格。全曲既有朝气蓬勃的活泼和催人奋进的激情，又有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勇往直前的气势。这首歌很快飞出校园，唱遍抗日前线。它跨越时空、一直传唱至今，作为国防大学的校歌，激励着全校师生奋发进取。

1937年，作曲家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辗转至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深入晋东南根据地体验生活。他吸取了当地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哼唱的民间小调，并根据游击战特点，创作了《游击队之歌》，刻画游击队战士在艰苦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念。

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中，《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被重新唱响，迅速把大家带入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引发强烈共鸣。这些战歌中记录的“民族耻辱、深重苦难、艰苦卓绝”等，至今如长鸣的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民族必须振兴。其中蕴含的爱国爱党、团结奋进、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等精神，激励着人们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抗日战歌，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用血与火铸就的文化丰碑。我们不仅是音乐旋律，更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呐喊与担当。战歌不朽，精神长存。

三

为打造出一堂精品课，在前期筹备阶段，创作团队走进李大钊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多地调研，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并多次与李宏塔、李柔刚等李大钊后代交流座谈。

创作团队在采访和调研中感受到，李宏塔、李柔刚及其家人性格谦逊温和。当问及他们为何能够守父辈遗志、为党为民无私奉献时，他们的回答总是质朴的三个字：“应该的。”

“是精神与信仰的指引和优良家风的浸染，让他们拥有了这种崇高的自觉。”在文艺情景课中扮演李宏塔的老师王峰深有感触地说。

为在有限时空中呈现李大钊家族四代人的精神脉络，创作团队反复打磨剧本、删繁就简，只留下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片段。

在舞台设计方面也是一律从简，以多媒体大屏为主要视觉呈现，以桌椅、书柜、老电视等简单物件作为辅助，打造一个勤俭、清廉的情景氛围。

这堂课用真诚的表达告诉观众：红色家风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藏在晨读时的琅琅书声里，留在欠条上鲜红的印指中，融进了数十年的自行车、陪伴科研攻坚的大脑中。

“‘红色家风’一词不应是历史的标本，而要成为川流不息的长河，源泉清澈、活力恒久。”上完课后，学员凌培元在笔记上认真写下这段话。

正如主讲人杨宏在课堂上所言：红色家风跨越百年依然滚烫，它是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

守望

陈武斌图/文

这张照片是我随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执行巡逻任务途中拍摄的。战友们短暂休息时，向界碑的方向眺望。我采用对角线构图、长焦镜头、高速快门的拍摄手法，让坐在山巅的战友们与连绵雪山同框。壮美山河，是一代代边防官兵永远的守望。

剑花

时下，各种印制精美的台历、充满创意的电子挂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我还是喜欢那种老式的“年历簿”。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到岁序更替，父亲就会买回一本年历，挂在堂屋中间。那时的年历单一而纯粹，一册365页，一天撕去一页，就像季节更替脱掉衣服一样。其间的内容大都标注着农历节气以及农谚、农业生产常识等，可谓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每当年历只剩下最后一页时，父亲都会郑重地换上新年历，还把子女叫到身边说：“新的一年开始了，你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要用心做事，不可叫一日虚度啊！”

相对于这种简单而质朴的仪式，一些文人的感触和体验就颇有文采和内涵了。我曾读到两篇《新年试笔》，一篇是茅盾先生1934年写的，一篇是阿英先生1935年写的，都是散文的笔触、自省的风格，读来耐人寻味。

茅盾在《新年试笔》里反省了自己在一年中的“德行”，发觉自己渐渐缺失了那种办事认真、仔细的“少年精神”，沾染了“马马虎虎”的习气，从而希望自己在新的年历里，恢复那种“少年精神”。

阿英在文中说明了这么两种人，一种是“企图糊里糊涂过年的人”，一种是“很热烈地在期待”“亲切地体验着的人”。显然，后者是“具有一种战斗的心情”的。

我想，无论是儿时换年历的仪式感，还是文人在《新年试笔》中所表达的情感，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当辞旧迎新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岁序更替，要从中有所顿悟、有所收获、有所升华。认真地对过去的一年做一个盘点，看看收获了什么；认真地做一番自我解剖，看看还有什么不足；还要想想在新的一年里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好。这样，才能像阿英在文中所说的那样：“看到天色放鱼肚白，就要提着灯笼去迎接新的行动。”

茅盾在《新年试笔》中，对自己的无情解剖令人钦佩。人的心灵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它可以开出鲜花，也可以长出杂草。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灵开出鲜花，散发出芬芳，然而杂草却在不知不觉间长了出来，掩盖了鲜花的美丽。时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诱惑。要想不为诱惑所迷，就一刻也不能忽略警醒自我、反省自我。只有如茅盾那样认真检查自己一年中的“德行”，无情地解剖自己，才能避免让心灵长出杂草，让心灵之花开得更加绚丽、散发芬芳。

阿英在《新年试笔》中，通过对两种人的解剖，激励自己在新的年历里，做一个“热烈地在期待”“亲切地体验着的人”，而不能做“糊里糊涂过年的人”。这样的警策更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催人奋进。

盐阜薪火

■余国强

红色足迹

房屋，“银八滩”一夜成废墟。时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诚承诺：打跑鬼子还大家“金八滩”。3月30日，谢振华团长率24团攻打日军据点，击毙日军中队长，全歼伪军一个大队，迫使日军放弃沿海重镇八滩，成功粉碎日伪军的“屯垦计划”。

在一面展墙上，“刘老庄连”82名烈士的英勇事迹映入眼帘。我从小就是听着“八十二勇士”的故事长大，亲眼看到这些珍贵资料和遗物时，内心产生强烈震撼。1943年3月，日伪军千余人合围淮海地区党政机关。新四军第3师4连82名勇士奉命掩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他们依托交通沟与数倍之敌激战，连续打退敌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战至黄昏弹尽粮绝，最终他们全部壮烈牺牲。战后，群众选送82名青年补入连队，部队命名其为“刘老庄连”。

展厅另一侧，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的事迹令人扼腕。1944年9月，他率第4师转战豫西，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全歼伪军李光明部1500余人，己方仅伤亡24人。这份由参谋长张震代写的《战斗详报》，却记载着此役最痛的损失——师长彭雪枫壮烈牺牲。

在接下来的展柜中，一枚奖章和一本证书引人注目。它们属于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参加新四军的第一位国际友人。1941年，罗生特带着医疗器械在茅草屋建起“战地医院”，救治伤员、培养医疗人才。他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把青春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展厅尽头的地图上，郭猛镇、云彩村、东平村等128个红色地名星罗棋布，248处革命遗址遍布盐阜。盐阜人民把感恩刻进路标，用红色地名串联起精神图谱，让铁军精神代代相传。

走出纪念馆，我看到几位系着红领巾的小讲解员在为游客讲述文物故事，稚嫩的声音充满自豪。一阵寒风拂过，我却感到暖意涌动：那些镌刻在地名里的记忆、陈列在展柜中的赤诚、传承在少年口中的故事，都是不灭的薪火。这薪火，在盐阜大地上代代相传，照亮着不忘初心的前行路。

红色家风润初心

■林梓栋 高文思琪

情景再现的内容如何选取，叙事框架应该如何设计，串讲内容怎样更好引领思想，对上好这节课至关重要。

文艺情景课编导股殊双双谈道，李大钊的历史人物形象和故事被公众熟知，在课程开头选择演绎“李大钊以生命绝唱立言”这一历史事件，不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让听课者在一开始便产生了情感共鸣。

纵观整堂课，以李大钊家族四代人的真实经历为叙事基础，从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牺牲，到李葆华“灾荒中的李青天”的担当，再到李宏塔“民政行走三十年”的坚守，以及李柔刚“科技强军”的创新，创作团队通过一个个有温度、有筋骨的故事，串联起“红色家风”在四代人间的传承脉络。

“这四代人恰恰对应了中国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的四个阶段。”杨宏说，从革命时期李大钊为追求真理不畏牺牲，到建设时期李葆华为民服务，改革开放时期李宏塔坚持廉洁用权，新时代李柔刚投身科技强军事业，“红色家风”的精神内核在传承中不断升华。

二

红色家风，“红色”是根，“家”是具体承载。这就需要创作团队将宏大主

题与细刻画结合起来，通过对生活图景的还原，阐释红色家风的时代脉络和精神内核。

创作团队在构思时，首先思考的便是李大钊人物的立体形象。“他不仅是一位革命英雄，同时也是父亲、丈夫。”股殊双双说。

还原和塑造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的家庭关系，是这节课的一个重要内容。课中有一幕，演绎了赵纫兰向李大钊讲述家中生活拮据的困境。李大钊虽有愧疚，却仍惦念着需要救助的学生和穷苦百姓。见到此景，赵纫兰选择咬紧牙关、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这一生活场景的还原，让“家风”和“红色”主题都更加具象化。

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走向领导岗位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始终情系人民冷暖、心系百姓安危。在塑造李葆华形象时，创作团队选取了“马渡村一夜”，演绎了李葆华孤身下乡、听取灾群众讲述灾情的情景。红色家风的精神内涵，在李葆华身上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创作团队还巧妙设计了李大钊和后代“跨时空对话”的场景，不仅成为红色基因接续传承的生动体现，更诠释了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践行“铁肩担道义”的担当精神。

